

山西社科研究与普及书系之三

晋商与明清山西 城镇化研究

JINSHANG YU MINGQING SHANXI
CHENGZHENHUA YANJIU

高春平 主编



山西社科研究与普及书系之三

晋商与明清山西 城镇化研究

JINSHANG YU MINGQING SHANXI
CHENGZHENHUA YANJIU

高春平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商与明清山西城镇化研究 / 高春平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57-0828-8

I. ①晋… II. ①高… III. ①商业史—研究—山西省—
明清时代②城市化—研究—山西省—明清时代 IV. ①
F729②F299.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840 号

晋商与明清山西城镇化研究

主 编:高春平

责任编辑:张仲伟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太原市金容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3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3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828-8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社科研究与普及书系 编委会

主 任 侯秀娟

编 委 王志超 王纪山

王崇德 赵秀峰

总 主 编 侯秀娟

总 策 划 王志超 王灵善 张继红

副 主 编 王志超

编 辑 郭红铁 萧凯红 冯聪玲

《晋商与明清山西城镇化研究》 课题组

组 长 高春平

成 员 宋丽莉 董永刚 陕劲松 赵俊明 王勇红

让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精彩绽放

序言一

侯秀娟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这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征途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确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八大庄严宣告,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国家,即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作为今后的总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以“五位一体”的格局为总布局,艰巨而光荣,现实而宏伟,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两个百年目标,不仅是经济硬实力要高度发达,在现在的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基础上再往前发展,每年保持至少7%以上的发展速度,才能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必须有文化软实力与之相适应、相匹配,才能真正体现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姿。现在我国的文化产业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已经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大有超越之势。没有一个世界大国是经济的巨人,而是文化的侏儒,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双轮驱动、两翼齐飞才是科学发展之路,也才是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她以连续不断地文化艺术长廊,为世界展示了一个精美绝伦的东方文明的殿堂标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其源泉和动力,就是中华文化充满蓬勃生机,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其生命力和创造力所孕育着无限的能量,始终使中华民族富含昂扬斗志和

创新激情。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的大发展提到了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到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使文化建设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布局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使“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持续迸发”,这就是党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又有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洋洋大中华,理应除经济之外为世界贡献更多更美的文化精品,这才是展现中国气派与中国风度的大国风范!

山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山西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提到了与挖煤、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已经迈开了豪迈的步伐,而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锐不可当,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带动作用的引擎。到“十二五”末,文化产业所创造的GDP占5%的份额,就是实证!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全省群众性学术性人民团体,25年来团结和带领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大胆创新,潜心研究,扎实工作,为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党的十八大精神鼓舞下,山西省社科联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要以新的姿态、新的成就,展示出新的风貌。为此,山西省社科联决定推出“山西社科研究与普及书系”这样一套系列丛书,旨在挖掘山西历史文化,创造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激发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之成为服务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武器。当然,文化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次、多视野的立体式研究,因此,既要有基础理论方面的精品研究,又要有普及方面的通俗读物,普及与提高同步。既要有历史文化的研究,更要有体现时代特色的创新成果,历史与现代传承。这是一个开放的书系,也是山西省社科联的一项长期工作。有好项目、好成果,我们就及时推出,暂时没有成熟的精品力作,我们就下工夫去组织团队攻关,有组织有步骤地做好这套书系的编纂工作。

美丽中国,她是历史中国的青春焕发,她是现实中国的靓丽展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山西这样一个个美丽部分去构建,去熔铸,去烘托,去展示,而文化是美丽中国的灵魂。作为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在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高潮中,我们要用深邃的理论精品,精美的文化拳头产品,脍炙人口的通俗作品,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美景,为美丽中国炫丽盛开的灿烂前景,奉献出我们全部的力量与智慧!

2012年11月22日

借鉴晋商经验 推动山西城镇发展

高春平

城市是人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人口的集聚而兴起的生产、生活区域,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明清城镇的发展是商业文明直接带动的结果。晋商作为明清著名商业集团,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晋商研究倍受到国内外专家重视,成果迭出,但专门探究晋商与明清城镇化的成果较少。目前,我国城镇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十二五”时期,城镇化率每年将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省在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宏伟战略中,也把加速推进城镇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部署。2009年,山西省的城镇化率为46%,在全国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因此,有必要摸清山西古代城镇发展的脉络。

城镇的发展是商业文明的结果。平遥、祁县、太谷作为明清晋商的核心功能区,在山西及周边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推动了全国120多座大中城市商业金融的发展,并带动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一批城镇的兴盛与繁荣。平遥的街巷布局堪称明清县级城市的经典范例。在目前,山西作为国家综改实验区,在推进“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建设中,工矿型城镇居多,商贸型城镇不足,故而借鉴历史经验,统筹城乡发展尤为重要。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晋商研究备受国内外重视,成果迭出,但专门探究明清晋商城镇化的成果较少。俄、日学者对此关注较早。1892年,俄国探险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来华考察后出版两卷《蒙古及蒙古人》,记述晋商对张家口、归化、多伦诺尔、科布多、库伦等城市商贸繁荣的作用。二十世纪日本学者佐伯富、小野和子先后发表《山西商人的起源与沿革》、《清代的山西商人》、《山西

商人和张居正》等文。1972年,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认为中国北部边塞的商品流通,“在现象上表现为商人的活动以及作为商业贸易集中点的商业城市与城镇的发展”,该书在国内影响很大。此外,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用中心地学说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不同程度涉及晋商与明清城镇。

新中国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探讨晋商与城镇,如傅衣凌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山西财经学院编《山西票号史料》可谓发轫奠基之作。1978年后,晋商与明清城镇渐受关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史若民《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高春平《晋商学》等书对明清晋商活跃的一些商贸集镇市场深入探讨。1992年,许檀、赵世瑜在《历史研究》分别发表《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与《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许对清代南京商业、河南商业重镇周口、赊旗、朱仙镇的晋陕商人进行研究。赵世瑜研究了明清时期华北地区庙会情形及其经济、文化功能。随后,方行在《历史研究》发文,深入探究清前期农村集镇市场的发展。张世满通过晋蒙粮油商道考察黄河沿线城镇磴口、包头、河口、磴口商贸流通如何带动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行龙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张萍探究了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趋势。2009年,陈梧桐著《黄河传》认为,明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许多中小城市应运而生,黄河流域以晋商为主的商人活跃,以郑州—太原为轴心形成城镇网络。2012年8月22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专门举行《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发展论坛》,认为晋商用独特的精神和创造力,推动了国内外众多著名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但从总体看,国内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成果多,而北方城镇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系统、深入、专门研究晋商与明清城镇发展的成果不足。

山西省委、省政府把市域城镇化作为山西资源型地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研究明清山西晋中商贸城镇,一是可以深化和拓展明清晋商研究领域,发掘山西与周边城镇发展状况,展示商业文明在人类城镇化进程中的巨大功用;二是通过明清晋中崛起商贸城镇的发展演变,人口流动,探索晋商对明清中国北部中小城镇的带动影响及其农民非农化趋势,从中总结其内在规律;三是为推进当今山西扩权强县、太(原)榆(次)同城化及汾介孝一体化,特别是县域经济与山西中小特色城镇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本书从人口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角度,探讨晋商与城镇发展演变的本质特征,中小商贸城镇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户籍管理与改革,从而对明清时期城镇的兴盛根源,移民对城镇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得出有益的借鉴。

(1)系统探究明清晋商对包头、河口、运城、平遥、碛口等黄河中游中小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深入剖析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的真实程度和实际效用。

(2)深入分析晋商促进城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与辐射带动功能;实地考察了明清山西平阳、泽潞、平遥、祁县、太谷、河曲、保德、右玉等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方式以及从事金融业(票号、银号、钱庄)、运输业(驼帮、马帮、车帮)、物流业(客店、商铺、货栈)带动三产兴盛状况。促进山西周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兴盛状况。

(3)从历史眼光看,山西“十二五”期间的“大”字形城镇布局仍有欠缺,没有把明清时期曾经兴盛数百年的黄河沿岸河曲文笔镇、兴县黑峪口、临县碛口等商贸城镇规划进去。所以,山西今后尤其是“十三五”规划应把山西沿黄城镇包纳进去,发挥晋中平、祁、太辐射点规模,使城镇格局由“大”字形拓展为“太”字形。

本书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循着晋商由北部边镇—黄河流域—长三角洲开拓市场、带动城镇商贸发展轨迹挖掘史料,填补明清时期晋商带动中国北方中小城镇化研究的空白。课题组采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走访座谈等方法,充实文献资料。并采取计量统计、模块图表、动态曲线论证晋商带动明清中小城镇发展的数量、类型、规模、分布以及黄河决溢改道年份水患对城镇的影响,增强研究对象的科学性、现实性。

该书研究视野宽、综合性强,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城市经济学,属学科交叉创新成果。据统计,1978年后,城镇化研究著作四百多部,论文万余篇,但晋商与城镇化专题研究创新较少。

通过系统、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全面、科学地认识晋商在明清时期黄河中游中小城镇兴衰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汇聚人口、繁荣市场、流通物资、传播文化作用。

本书的主要观点:

商业文明在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互通有无、传播文明、活跃市场、繁荣城镇的重要功能。山西晋中商业城镇,是明清时期北方城镇区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在自然经济占主导、传统手工作坊经营多、机器工业相对缺少的时代,晋商贸易和票号融资功能的发挥,对明清山西周边中小城镇兴盛与繁荣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对推进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早期工业化、城镇化功不可没。

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大批晋商人流、物流带动中小城镇发展,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并带动明后期中国北方部分军事卫、所由单纯军镇向清初的行

政区化转化。晋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促成了一大批特色商贸城镇。今运城市,元代为村,明行开中法,河东盐产销两旺,聚集全国 500 家商贾,这座新兴盐城渐成晋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宣大、山西镇所辖数十卫、所。“封贡互市”后,商贸大兴,边镇人口日增,许多卫、所逐渐发展演变为行政区。如陕西山丹县、山西省右玉县、天镇县等均由原山丹卫、玉林卫、天成卫、镇虏卫演变而成。清代平遥、祁县、太谷票号兴盛,一度为全国金融中心。位于黄河边的包头、磴口镇,是晋商集散大西北牲畜、皮毛、粮油的“水旱码头”;张家口(东口)、杀虎口(西口)原是军事重镇,由于晋商活跃,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贸易商埠和关税口岸;侯马居晋南的核心区,发展为以商贸为主的物流重镇;鲍店镇以药材交易闻名全国;荫城镇号称铁货奔流天下。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生态变化、交通工具、线路的改变成为部分中小城镇衰落因素,影响了黄河中游沿岸山西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明清 500 多年间生态植被的破坏、导致灾荒频发,水土流失加剧,风沙淹没右卫城墙。明代黄河有记载的决溢年份 59 年,禹门口以下河段的决溢,使晋、陕、豫沿岸城镇永济、蒲州、万荣、河津、孟津等州县多次遭灾。清代康熙元年到十六年,黄河下游溃决 67 次,冲毁城池,淹没无数官廨民居。河南朱仙镇、山西蒲州、磴口镇、风陵渡的兴衰均与黄河决溢、近代火车、铁路兴起后交通工具、路线的改变有关。

本书对中国古代山西城镇发展概况,明清时期山西晋北、太原、晋南、晋东南城镇商贸发展状况进行了探究,并发掘明清时期黄河沿岸中小城镇的兴盛情况,展示了晋商商业文明在人类城镇化中的巨大功能,又可通过晋蒙人口流动,探索晋商商贸活动对明清中小城镇的影响及其非农化趋势,从中总结晋商带动城镇繁荣的内在规律,为当今城镇化,特别是中小特色城镇建设提供有益历史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宋辽以前山西古代城镇发展概况

第一节 城市的肇始与形成	001
一 城与市	001
二 城市缘起的推动力	007
三 山西最早的“城”——襄汾陶寺城址	008
第二节 山西古“城”的发展概况	010
一 传说时期	010
二 历史时期的山西重要城镇	013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山西城镇的发展与繁荣	022
一 北都太原	022
二 蒲州	023
三 绛州	025

第二章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城镇与商业贸易的发达

第一节 宋辽金元时期的城镇设置	026
一 城市坊市格局的打破和经济职能的增强	027
二 宋至元时期山西城镇的设置	029
第二节 宋金时期城镇的快速发展和元代城镇的调整	034

第三节 城镇核心区与中心都会的形成	037
一 太原地区	037
二 河东地区	039
三 雁北地区	042
第四节 城镇发展对商业贸易的影响	043
一 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的兴盛	044
二 金代商业禁例的宽松和行业组织的普遍	046
三 元代大一统局面和商业勃兴	047

第三章 晋商与明清时期晋北地区的城镇化

第一节 晋商与明清晋北地区城镇的发展	049
一 明清晋北军事城镇的发展	050
二 晋商对晋蒙地区开发与新兴城镇兴起的推动	052
第二节 明清时期晋北地区主要商业城镇	055
一 大同	056
二 归化城	058
三 包头	061
四 宁武	063
五 杀虎口	065
六 其他城镇	067

第四章 晋商与明清时期山西中部地区城镇的发展

第一节 明清山西中部商业城镇的发展	072
一 主要的商业城镇	072
二 明清山西中部地区商业城镇发展的特点	088
第二节 明清太汾商人的发展	091

一 矿产业	091
二 手工业	093
三 金融业	094
四 贩运业	095

第五章 晋南、晋东南地区明清城镇发展

第一节 晋南城镇发展	099
一 传统城镇商业化发展	100
二 因资源而兴的商业城镇	107
三 因交通而起的商业城镇	109
第二节 晋东南城镇的发展	112
一 传统城镇	112
二 因资源而兴的商业城镇	119
三 因交通而起的商业城镇	126
第三节 传统市镇的变迁	127
一 洋货对传统土货的冲击	127
二 新的交通格局对传统市镇的影响	129

第六章 晋商带动明清时期黄河沿岸城镇的兴盛

第一节 明清时期山西境内黄河水运	130
一 黄河水运的发达	130
二 晋商贩运贸易带动黄河水运	131
第二节 黄河沿岸的主要商贸城镇	132
一 河口镇	132
二 河曲	134
三 保德	135

四 黑峪口	137
五 磧口	137
六 孟门镇	140
七 壶口镇	141
八 风陵渡	142

第七章 晋商对国内外城镇的带动

第一节 晋商茶叶贸易带动中俄边贸口岸恰克图——买卖城	143
一 恰克图买卖城市场兴起的背景	145
二 恰克图市场的创建与管理	153
三 发展中的闭市风波	162
四 恰克图市场的兴盛	164
五 市场的巨大作用	169
六 不见硝烟的茶叶大战	178
七 结论:输在国弱不在商	183
第二节 汉口——晋商支撑的物流大市场	185
一 弹丸小镇的崛起	186
二 晋商在汉口的茶帮、商号	186
三 晋商在汉口的钱庄票号	187
第三节 张家口——旅蒙晋商基地	189
一 张家口的军事管理与八大皇商	189
二 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旅蒙商主体是山西商人	190
三 晋商在张家口一带的经营项目	193
四 晋商在张家口的社会公益事业	200

第一章 宋辽以前山西古代城镇发展概况

第一节 城市的肇始与形成

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学术界公认是以城邦国家的形式出现在苏美尔文明地区。中国属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城市的兴起、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思想性、政治性、军事防御性及延续性等方面。这些特点又因地域和环境不同而表现风格迥异。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向上可溯及文明肇始的尧舜禹传说时期。秦汉以降,直至元明,山西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表里山河的环境成为历朝各代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军事战略要地。明清时期,晋商的崛起再次使山西城镇发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这种发展不能同今日的城镇化步伐相比,但毕竟山西商人的长途贸易影响本省并带动了全国一大批商贸城镇的兴盛。

一 城与市

中国古代早先没有“城市”这一称谓。“城”和“市”在最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不同范畴,二者并无直接的关系。“城”指用作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是防御性的概念,是为社会的政治、军事等目的而兴建的;“市”则是指城中特定的交换场所,是贸易、交易的概念,是生产活动、商贸活动所需要的,其形态是开放

的、外向的。这两种初始的空间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变得日益丰富和扩大,并相互渗透,界限逐渐模糊,交错杂陈在一种新的环境形态之中,最终形成了内容丰富多样、人口密集分布、聚居结构复杂的形式——城市。

“城市”一词最早见于战国史籍中。《韩非子》中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籍威城市。”^①只有当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防御功能的“城”与商品交换的“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才会在语言文字中出现“城市”一词。所以说,“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有机结合的范畴,“城”和“市”是城市中较为重要的方面。而“城”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语言中形成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词,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首先说“城”。“城”属于政治范畴。《辞海》在解释“城”这一概念时说:“(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所谓的“城”,究其原意,本是指盛民、自守而言。《说文》云:“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段玉裁注云:“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礼记·礼运》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郭沟池以为固。”《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从上述解释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城”的原始含义是为防卫自守所设的军事设施,即城堡。它最初的作用是驻扎人马,防止敌人侵害,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而转化成为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意义。

既然“城”的产生是受一定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那么可以肯定这一新兴事物的出现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私人财富的出现、积累,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宗教偏见及血亲复仇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敌对部落的侵袭和保护私有财富,筑城自守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因而“城”便应运而生。

古代文献中关于上古时期“城”的记载很多,古史传说中就有:“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黄帝为五城十二楼。”“黄帝筑城造五邑。”“神农之教曰,有城十仞,汤池百步。”“夏鲧作城。”“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这些传说,近来已被考古发掘的

^①《韩非子·爱臣》,中华书局,2010年。